

法治赋能基层治理 为群众幸福生活“加码”

□ 孙北宸

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维系基层秩序、化解矛盾纠纷、保障群众权益的坚实基石。在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利益诉求日益多元的当下,基层治理面临着人际关系复杂化、公共需求多样化、矛盾诱因多元化等全新挑战,传统的治理模式已难以完全适配时代需求。唯有坚定不移地走法治赋能之路,以法治思维重塑治理逻辑,以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才能构建起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生态,切实为群众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培育法治思维 激活基层社会的法治主体活力

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践行。培育基层群众的法治思维,增强其法治意识,是法治赋能基层治理的核心环节,也是构建法治社会的深厚根基。

开展精准化普法教育。针对基层群众的年龄结构、文化水平、职业特点及法治需求差异,实施精准化普法。整合村(社区)、学校、企业等多方资源,组建由法律专业人士、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普法志愿者等构成的普法队伍,开展“菜单式”普法服务。举办法律讲座、法律咨询活动、法治文艺演出、法治故事会等,采用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重点普及与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同时,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社区广播等新媒体渠道,推送法治知识、典型案例,推动实现普法全覆盖,让法治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强化法治实践体验。搭建基层法治实践平台,组织开展模拟法庭、法治辩论、法律文书写作等活动,让群众亲身参与到法律程序之中,学习法律知识,掌握法律方法。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基层治理的法治实践,如参与矛盾纠纷调解、法治监督、公共事务决策等,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发挥榜样示范作用。挖掘和培育基层法治先进典型,评选表彰基层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守法模范等先进人物,宣传其先进事迹,让群众学有榜样、

行有示范。鼓励基层党员干部、乡贤能人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积极参与法治宣传、矛盾调解等工作,以自身行动影响身边群众,形成“人人尊法、人人守法、人人用法”的良好社会风尚。

构建多元解纷机制 打造基层矛盾化解的“缓冲带”

基层矛盾纠纷具有类型多样、诱因复杂、涉及面广等特点,单一的解纷方式难以高效、妥善解决所有问题。构建多元、协同、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是法治赋能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

完善人民调解体系。人民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具有灵活、便捷、高效、成本低等优势。加强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健全村、镇两级人民调解网络,优化调解员队伍结构,吸纳法律专业人才、退休法官、退休检察官等加入人民调解员队伍。加强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助力其夯实法律知识基础、提升调解实务技能与沟通协调能力,确保调解工作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定期开展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及时掌握矛盾动态,尽早发现、及时化解。同时,规范调解程序,完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赋予调解协议以法律效力,保障调解结果的有效执行。

健全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衔接机制。行政机关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在履职过程中会涉及大量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健全行政调解机制,明确行政调解的范围、程序和责任,引导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积极开展调解工作,妥善化解行政争议,解决相关民事纠纷。建立“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联动,搭建矛盾纠纷多元化化解平台,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例如,在基层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邀请人民调解员参与案件调解;在行政机关设立司法调解联络点,形成解纷合力提高矛盾化解效率。

探索新型解纷模式。随着基层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新型矛盾纠纷持续涌现,需要探索更多适应时代需求的解纷模式。针对劳动争议、医疗纠纷等专业领域,建立专业调解机构,聘请专业人士担任调解员,提高专业领域矛盾纠纷的化解

能力。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公证等矛盾纠纷解决平台,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线上解纷渠道,打破时空限制,满足群众多样化的解纷需求。

优化法治服务供给 筑牢群众权益保障的“防火墙”

法治服务是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提升群众法治获得感的关键环节。优化基层法治服务供给,构建普惠和高效的法治服务体系,是法治赋能基层治理的重要支撑。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整合律师、公证、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资源,在村(社区)设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点),配备专职或兼职法律服务人员,为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律文书代写、法律援助申请等服务。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明确服务事项、服务质量、服务标准和服务时限,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信息化建设,搭建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实现法律服务资源的在线查询、在线预约、在线办理,为群众提供“指尖上”的公共法律服务。

强化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是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将低收入群体、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等弱势群体纳入法律援助范围,降低法律援助申请门槛,简化申请流程,确保符合条件的群众能及时获得法律援助。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等的协作配合,建立法律援助案件指派、办理、监督机制,确保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鼓励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志愿者等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工作,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让群众在每一个法律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拓展专项法治服务。围绕乡村振兴、社区治理、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项法治服务,为农村土地流转、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小微企业经营、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等提供法律支持。加强对基层重点人群的法治服务,对刑满释放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等,开展法治教育、心理疏导和就业帮扶,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对青少年开展法治教育、预防犯罪教育,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关注基层新业态、新

群体的法治需求,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灵活就业人员等提供针对性的法治服务,维护其合法权益。

厚植法治文化底蕴 营造基层社会的法治生态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灵魂,也是法治深入人心的重要保障。厚植基层法治文化底蕴,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是法治赋能基层治理的长久之计。

打造法治文化阵地。整合基层文化资源,在村(社区)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场所,建设法治文化长廊、法治文化广场等法治文化阵地,通过设置法治宣传栏、法治雕塑、法治标语,摆放法治书籍、报刊,播放法治影视资料等形式,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结合当地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创作法治戏曲、法治故事、法治歌曲、法治动漫等文化产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法治文化品牌,开展法治文化艺术节、法治故事会、法治演讲比赛等活动,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治熏陶,提升对法治文化的认同感。

推动法治文化与民俗文化融合。基层民俗文化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实现法治文化与民俗文化的深度融合,将法治理念、法律知识融入民俗活动、传统节日和民间艺术之中。例如,在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期间,开展法治灯谜、法治对联、法治文艺演出等活动;在民间戏曲、民歌、舞蹈等艺术形式中融入法治元素,让群众在享受民俗文化的同时,接受法治教育,增强法治文化的亲和力 and 吸引力。通过民俗文化载体,传播法治文化,使法治文化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和认同。

加强法治文化宣传教育。通过在学校常态化开设法治课程、深入开展法治进校园等系列活动,着力培育青少年的法治意识与法治素养;在基层干部培训中增加法治文化内容,提升基层干部的法治文化素养和依法治理能力;在社会层面,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公平正义观,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和生活方式,让法治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底色。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比较的功能。所有界面均须适配移动端使用,从而为课堂评价范式智能化转型提供稳定、安全、高效的技术支撑。

培育专业化的教学评价队伍

推进课堂评价范式转型,人是关键变量。要打造适应转型需求的教学评价队伍,需根据参与者的不同角色设计差异化的培训内容。如对于一线教师,主要强化其对智能化评价工具的使用、评价指标的分析与解读以及评价结果应用的能力。培训内容可包含典型案例分分析,指导教师将AI生成的评价反馈变成具体的教学改进行动;对于教学督导、院级教学管理人员,应提高其对于评价数据治理、教育质量分析等方面的技能,指导其通过数据,总结教学趋势和共性问题;对于校级教学管理者,则要注重其对于教育评价改革理念、人工智能伦理与隐私合规、评价体系的设计方法论等方面的理解和运用。

高校还可创建虚拟评价实验室。一方面,可组织评价人员对数据采集、模型参数调整、结果解释及报告撰写等环节进行练习。另一方面,可集结教学一线教师、技术专家等对教学数据进行联合诊断,不断提升评价人员的实践应用能力。另外,还应组建一支以教育技术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专家为成员的评价小组,通过跨学科合作,突破技术壁垒,保证评价工具真正契合教学的实际需求。

AI技术为高校课堂评价范式转型提供了新方法。通过创建多元评价体系、加强评价精准导向功能、搭建智能技术平台以及培育专业评价队伍等举措,可为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提升高校教学质量和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提供坚实保障。未来,应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持续优化评价标准和方法,强化伦理规范及隐私保护,助力课堂评价范式持续优化。

(作者系西安外事学院国际合作学院副教授)

□ 马会芳

红色文化作为承载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淀的无形精神文化财富,在新时代语境下正迎来从静态史料存档向动态文化记忆转型的历史性契机,而实现这一转型的重要落脚点,在于推动党史叙事话语的时代性转换。面对数字化转型与多元思潮交汇的复杂场域,剥离传统宣教模式中略显生硬的刻板印象,转而以更具历史穿透力与情感共鸣度的现代话语体系,重塑党史叙事话语,成为让红色基因在代际更迭中永葆生机的关键举措。

党史叙事话语 重构与红色文化传播的内在关联

党史叙事话语是红色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在红色文化的当代传播视域下,蕴含在革命遗址、英雄事迹以及经典文献中的红色基因,若缺乏时代话语的编码与转译,终将止步于静态的物质遗存和抽象的概念符号,难以真正转化为大众自觉认同的文化信仰。作为连接宏大历史坐标与个体微观感知的介质桥梁,党史叙事话语可使传播主体通过党史讲解与红色文化实践,将散落于时间长河中的记忆碎片整合为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宏大史诗,进而在话语权力的运作与大众传播的互动中,建立起独具特色的阐释框架与价值传递路径。

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是党史叙事话语重构的实践动力。受众在审美旨趣、媒介使用习惯及信息接收偏好上的深刻变迁,使建立在单向灌输基础上的传统宏大叙事不可避免地陷入效能递减的现实困境之中,客观上促使党史叙事主体必须根据传播生态的演进逻辑探寻新的表达语态。正是出于这种谋求更高传播抵达率与情感转化率的内生追求,党史叙事不断从传统的政治宣传语境向兼具生活气息与人文温度的大众文化语境延展,推动红色文化符号在不断贴近受众的传播过程中焕发新的生机。

通过对党史叙事与文化传播深层逻辑的不断挖掘,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互为表里、相互建构的深度耦合关系。在理论视域内,话语作为权力的微观网络,其影响力的实现离不开媒介的物理延伸与社会裂变的双重驱动。要实现传播效用的最大化,必须以高质量、高纯度且具有较强逻辑性与说服力的叙事文本作为支撑,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沦落为缺乏精神内核的技术展演。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的时代语境下,面对外部意识形态渗透与内部多元价值观碰撞的双重挑战,唯有将党史话语重构的“内容深度”与红色文化创新的传播“渠道广度”进行有机融合,才能更好地在日益复杂的舆论生态中掌控解释权和舆论主导权,切实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国家文化安全屏障与民族精神高地。

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纵深推进,创新打造党史叙事话语体系与红色文化传播协同发展路径势在必行。通过塑造自信从容且饱含人情温度的传播姿态,向世界全面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在日趋激烈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博弈中,摹画出一幅具有深厚底蕴、生机勃勃的中华文化传承新图景。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系2026年度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一般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宣传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26YB0009)阶段性成果)

围,更贴近群众的创新传播,应依托现代社会的复杂网络结构,构建起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叙事共同体。具体而言,将长期处于接受终端的普通民众、具备专业知识背景的专家学者,以及深谙流量密码与青年亚文化语境的新媒体创作者,共同吸纳进内容生产与意义阐释的全流程之中,重塑党史叙事传播生态。例如,通过引入“众包模式”,吸引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参与地方党史档案的数字化转译或革命先辈口述史的抢救性挖掘,实现从“受众”到“主创”的角色转换,推动由党组织、政府宣传部门和主流媒体构成的单一垂直叙事体系转变为多元网状叙事生态,为宏大的党史叙事注入鲜活血液,有效促进红色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度渗透。

构建“大党史”与“小叙事”相结合的内容体系。叙事主体应将红色文化传播内容的“见事不见人”转变为“以人带事”,将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节点、路线方针等“大党史”宏大背景,经由微观个体的生命轨迹转化为具象化、烟火气十足的“小叙事”。因而,创作者应深入挖掘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曾被过滤掉的情感细节、生死抉择与人性微光。例如,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里,那位在铁窗下给刚出生女儿写下绝笔信的母亲。通过以小见大、由微至宏的话语策略和情感机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设起一座隐形的情感桥梁,使严密的逻辑论述生动嵌入感人至深的故事肌理之中。

发挥新媒体平台传播优势,开发沉浸式、体验式叙事载体。伴随媒介技术的迭代升级以及前沿科技应用的逐步落地,红色文化所依托的物理承载空间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纸质文本与实体纪念馆,而是呈现出向多维数字空间延伸的态势。因此,通过技术手段对处于静态封存状态的红色档案资源进行动态激活,是主动顺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丰富红色文化传播形式的重要途径。比如,打造“第一视角”的历史角色扮演沉浸式空间,或构建在虚拟维度进行“跨时空对话”的数字全息矩阵。通过赋予受众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自主选择权和建立即时反馈机制,适度开放非核心情节的多元化故事线走向,可以有效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和深度思考,使受众在强烈感官刺激与深度心理卷入之下,实现对红色文化精神内涵的心流体验与价值内化。

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纵深推进,创新打造党史叙事话语体系与红色文化传播协同发展路径势在必行。通过塑造自信从容且饱含人情温度的传播姿态,向世界全面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在日趋激烈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博弈中,摹画出一幅具有深厚底蕴、生机勃勃的中华文化传承新图景。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系2026年度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一般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宣传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26YB0009)阶段性成果)